

对《跨文化对话》的期待——站在 201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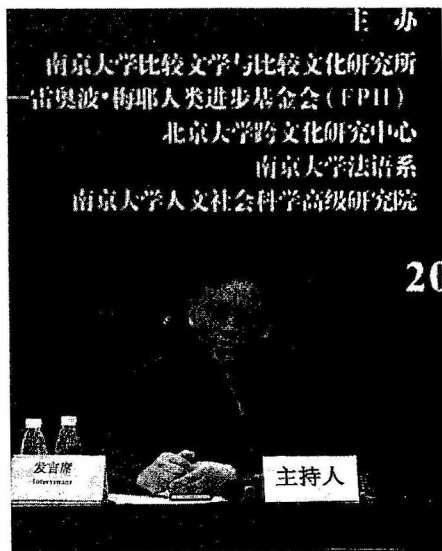
陈越光

四百年前,培根说过:“知识在书本之中,运用知识的智慧却在书本之外。”《跨文化对话》论丛创刊至今十年了,作为一本思想文化学术论丛,她的学术品位在论文中,但理解她的道义担当和追求,我们的视野却是要放在杂志之外。《跨文化对话》以中欧第三次相遇为历史背景,以跨文化对话为媒介,以探索 and 传播人类伦理责任和现代公民意识为己任,搭建了一个开放式的思想文化公共平台,得到了国内外学术文化界的认可和广泛参与。所以,我对她的期待和思考也并不是从她已出版的 23 辑论刊出发的。

期待总是指未来时态的。我想以 2018 年的时间点出发,来谈谈对于《跨文化对话》论刊的期待。

一、着眼于共同的问题

三年前,在第一届中欧论坛的总结发言中我提过一个观点——中欧第三次相遇的新背景是中欧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个缩影,而不是世



陈越光教授

界的另类(这个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能源与环境问题,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文化与经济失衡,在世界潮流中迷失自我,所有的冲突、迷惘、失望,有什么是中国没有遇到的呢?);欧洲已经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世界的代表(一百年前,中国人追求现代化之梦,就是欧洲的民主政治制度、市场经济模式、人文精神文化。所以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看世界就是看欧洲,欧洲就是世界的代表。但是,在今天我们认知的世界里,欧洲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

而今后十年,中欧第三次相遇中的另一个背景将会越来越显现: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挑战和压力。无论是在始于16世纪末以文化相遇为特征的第一次相遇时,还是在始于19世纪武力进伐为特征的第二次相遇时,我们都可以想象中欧之间“井水不犯河水”的生存状态。今天,没有这种可能了。不仅中欧,而且全体人类,只有共生,或者共亡。我们必须互相了解,但我们共同如何生存比你我各自曾经怎样生存更重要。因此我们最好的互相理解、最好的对话,就是从我们共同的问题出发。

这就好比一对中法男女青年结合了,他们对互相差异性的探究,他们的互视,他们之间的跨文化对话可以浪漫而长久。但如果他们很快有了孩子,这孩子不幸病魔缠身,这时候,他们必须共同面对这个挑战,在回应挑战的过程中他们的对话、理解、默契都会产生。在中欧对话的平台上,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这个孩子白天的名字叫“危机”,夜里,我们梦中叫他“希望”。人类的美妙前景是我们的梦想,没有梦中的执著,我们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白天,我们还是要理性面对人类现有生存方式不可能持续的的压力和挑战。《跨文化对话》要着眼于这个共同的问题!

二、着眼于个体对话

六年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对话会上,我听到一位微软副总裁的惊人之论:2014年,最后一张报纸将在发行意义上消失!

对于《跨文化对话》论丛来说,重要的不是何时出网络版或者有什么样的网络版,而是在未来十年,需要真正理解互联网所创造的一个“点对点”的世界。加里·哈默指出,20世纪及以前的社会结构犹如树木和车轮,大部分的联结是垂直的或者是以中心为基准的。而在互联网世界却是“全覆盖”的,“点对点”的。网络的无边界、无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类历史中存在已久的组织模式提出了挑战。

个体是相对概念,在国际层面,国家可以是个体,城市对城市也是点对点,相应的职业群体、行业、企业都既有个体的一面也有整体的一面。但着眼于个体,

最终是着眼于个人。跨文化对话最终是个人的体验和实践。《跨文化对话》论刊中曾讨论过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什么没有出现能“拷问灵魂”的作家群,反思近现代文学所谓宏大叙事的文学模式。要拷问灵魂,必须着眼于个体:灵魂属于个人。前些日子中国出现“问题奶粉”事件,事后处理是果断的,但高官问职、法办肇事者、经济惩罚、企业写保证书等,都只是治标。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在产业链最底端的人获得合理收益的经济分配制度,根本是重建公民的个人伦理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没有人可以对其他人负责。

因此,“对话”须着眼于个体,着眼于个人的体验、认知、承诺和责任。

三、着眼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们

从2008到2018年,是全球化进程面对能源危机(背后是地球资源与人类经济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的冲突)和恐怖主义(背后是伊斯兰教不接受工具理性与所谓现代性的对抗)两大挑战如何回应的重要时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后,社会与经济进入震荡、实现调整和接受考验的时期;也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们(“80后们”)从二三十岁到三四十岁的十年。

在互联网世界,我们只是移民甚至只是旅游者,他们是原住民。没有柏林墙而有互联网;没有意识形态的恐惧而有环境和食品污染的恐慌;以个人的全球化参与为特征的所谓全球化3.0时代;等等——在我们,这是天翻地覆的巨变,在他们,这是与生俱来和他们一起成长的世界。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曾描写过新一代在精神上“像吐净宿食一般”地反叛传统,而他们则并没有真正把传统吃下去过,因为他们的父辈就曾被称作“迷茫和反思的一代”,他们一开始就在跨文化的对话之中。

《跨文化对话》杂志是一份比较高端的思想性、学术性论刊,但对这一代新的人,不可能等他们成熟了来当我们的读者,来继承我们或者批判我们,而是在这十年中需要和他们同行。在某种意义上说,不管这个世界是好还是坏,不管是谁造成的,我们是在和他们的世界对话。可以说,如果我们放弃了,我们不承担责任,他们可能就没有未来。当然,我们不会放弃,有《跨文化对话》在,就是我们责任感的证明。但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光凭我们的经验和眼光,没有来自他们的直觉和新的智慧,我们,看不清未来。

本文为作者2008年9月25日在“跨文化对话
暨丛刊创刊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